

明朝的教训

陈童

1 投降主义的代价：从明末买办到现代迷思的历史警示

一、一个被误读的历史转折

明末清初的变局，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教训之一。当时江南的工商业资本——那些掌控着丝绸、棉纺、钱庄和盐业的巨贾们——在面对李自成的农民军和满洲八旗的夹击时，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政治选择。

他们选择了后者。

这个选择并非毫无逻辑。元朝的历史给了他们一种错觉：蒙古人统治天下，对商业活动相对宽容，色目商人甚至在帝国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。这些明末的资本家盘算着，新的征服者大概也会延续这种“务实”的统治方式——只要交足赋税，不干涉政治，商业帝国就能继续运转，甚至借助新朝的秩序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。

他们错了，而且错得彻底。

清朝入关后，确实短暂地利用了江南的经济力量，但很快就展现出与元朝完全不同的统治逻辑。剃发易服不仅是文化羞辱，更是对地方精英的政治驯化；迁界禁海摧毁了沿海工商业的根基；文字狱的罗网让任何独立的思想都成为高危行为。所谓的“自由发展空间”，在满清统治的碾压下化为泡影。那些曾经幻想“在商言商”，抛弃民族国家的资本家，最终不过是案板上的鱼肉。

更深层的历史讽刺在于：这些资本家的投降，不仅没能保全自身，反而加速了一个文明生态的崩塌。他们以为自己在做理性的经济选择，实际上却成为了摧毁自己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的帮凶，甚至断送了子孙后代的未来。

二、迟来的“翻盘”与错失的机遇

直到十九世纪中叶，以曾国藩、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官僚通过镇压太平天国和兴办洋务，才真正掌握了实质性的权力。然而世界向中国敞开的历史机遇早就错失了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曾李二人绝非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。他们是旧秩序的维护者，是满清的忠实奴仆，其“自强”运动充满了妥协性和局限性。但即便如此，他们的崛起本身说明了一个残酷的事实：在清朝两百多年的统治中，汉族精英长期被排斥在核心权力之外，整个民族的创造力和组织能力都处于被压制的状态。

这两百年，恰恰是世界历史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时期。当中国还在异族统治的枷锁下内耗时，西方完成了工业革命，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体系，开启了全球化扩张。等到汉族官僚终于有机会推动一些现代化尝试时，历史留给中国的窗口已经极其狭窄。接踵而来的，是通常所谓的“百年屈辱”——一系列不平等条约、领土割让、主权丧失，以及深重的民族危机。

这不是偶然的历史巧合，而是投降主义必然付出的代价。当一个文明主动放弃政治主体性，将命运交到异族征服者手中时，它失去的不仅是当下的自由，更是面向未来的可能性。机会的窗口一旦关闭，可能需要几代人的血与火才能重新撬开。

三、文明存续的生死线

这段历史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：如果没有后来的历史转折，中华文明将走向何方？

一个可能的结局是文明的终结——是文化主体性的彻底消解，沦为某种“博物馆文明”，供人凭吊但不再具有现实生命力，甚至是物理意义上的灭绝。另一个可能是长期停滞，成为一个二三流的国家，在历史边缘地带苟延残喘，其人民在精神上永远处于被殖民状态。

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改变了这一轨迹。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，中国重建了政治主体性，恢复了文明自主发展的能力，并在几十年间完成了从农业国到最强工业国的跨越。这一历史成就的意义，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——它不仅关乎政权更迭，更关乎一个古老文明能否在现代世界中获得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。

明末买办资本家的教训因此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意义：投靠异族文明，即使在个人层次上也是一种高风险的赌博，最终必定会输得精光；而在国家民族层次上，这更是在充当历史罪人，在断送子孙后代的未来。这不是道德说教，而是被反复验证的历史规律。

四、当代的迷思与现实的残酷

历史似乎总在以新的形式重复自身。近百年来的移民潮中，无数人怀揣着类似的梦想离开故土，期待在异国的土地上获得“自由的发展空间”。他们中的许多人，正是被一种简单的叙事所吸引：换个国家，就能摆脱制度的束缚，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。

但统计数据给出了冷酷的答案。据相关研究，第一代移民中的绝大多数——有统计显示高达80%以上——最终绝后。这里的“绝后”是文化意义上的断裂：他们的后代完全融入当地主流，失去了与母文明的精神联结，那些曾经珍视的文化传统、价值观念、家族记忆，都在几代人之内消散殆尽。但他们的“绝后”不仅是在文化意义上，更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无嗣。

人类社会从来不是温情脉脉的。这是一个关于生存竞争的残酷真相：要么你的文明在同异族的竞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，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和影响力；要么在长期的边缘化过程中，逐渐失去存在的痕迹。中间道路是不存在的，“融入”往往意味着被消解，“共存”常常导向被同化。

当然，中国人从不畏惧竞争。纵观历史，我们向来是竞争的胜利者——在东亚的文明格局中，在漫长的技术演进中，在复杂的社会组织创新中，中华文明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和创造力。但竞争的前提是主场优势，是文明网络的支撑，是文化自信的底气。你孤身入狼穴，与狼共舞，还能否最终取得竞争的胜利？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掂量的问题。

个体或许可以在异域获得某种“成功”，但这种成功往往是高度个体化的、去文明化的。你可能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，获得经济上的回报，甚至进入当地的上流社会，但这与“发展空间”是两回事。真正的发展空间，意味着你的后代能够继承一种有意义的文化传统，能够在文明对话中保持平等的姿态，能够为人类知识的整体进步做出独特的贡献，至少意味着你得有后代。而这些，在文化异质的环境中极难维系。

五、解构与自信：一个仍需正视的问题

谈论这些历史教训，并不意味着对特定族群的偏见。满族当然是中国的一部分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但历史造成的深层心理结构，却需要被正视和理解。

以王朔为例。作为当代文化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，他一直在持续地解构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。如果将这种解构置于漫长的历史脉络中观察，会

发现一种反复出现的模式：在文明相对弱势的时期，边缘群体中的优秀分子往往通过否定中心来获得自我肯定。

王朔需要证明自己的优秀，而在那个中国还不够强大的年代，落后的只能是中国的传统和文化。这不是个人品德的问题，而是人性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自然反应。当一种文明无法为其成员提供足够的尊严和发展空间时，其成员就会倾向于通过疏离甚至否定这种文明来确立自我价值。

这种心理机制是普遍的，但在不同群体中的表现强度不同。对于汉族知识分子而言，文化认同的根基相对深厚，解构往往伴随着重建的冲动；而对于历史上曾经处于统治地位、后来成为普通国民的群体，解构可能带有更复杂的身份政治色彩。理解这种差异，不是为了制造对立，而是为了更清醒地认识文化建设的艰巨性。王朔们的心理和你一个汉人是不同的，只是我们后知后觉。

今天的中国已经强大起来，但这种强大尚未完全转化为文化自信。我们仍然能看到各种形式的自我否定，看到对西方模式的盲目崇拜，看到对本土传统的轻率抛弃。这说明，主体性的重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不仅需要物质力量的积累，更需要精神层面的自觉和坚持。

六、结语：在历史教训中确立主体性

从明末买办到当代移民，从文化解构到身份迷思，贯穿其中的是一条关于文明生存的清晰线索：主体性是不可让渡的。无论是通过政治投降、地理迁移还是文化自我否定，一旦放弃了对自身命运的自主掌控，付出的代价将是代际的、不可逆的。

这不是要鼓吹封闭或排外。文明的活力在于交流，在于吸收异质文化的优秀成果，在于在开放中保持自我更新。但交流的前提是平等，吸收的基础是自主，更新的方向必须由自己把握。任何以放弃主体性为代价的“开放”，最终都导向自我消解。

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，这段历史的最大教益在于：我们必须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中，清醒地维护文明自主发展的能力。这意味着不幻想通过依附获得发展空间，不期待通过解构获得文化资本，不迷信通过移民获得更好未来。真正的出路，在于立足本土，深耕传统，在解决自身问题的过程中创造新的文明形态。

这是一个民族的必修课。只有通过了这门考试，我们才能说，百年屈辱的历史教训真正被汲取了，明末那场悲剧的真正意义被理解了，而那些在历史迷雾中做出错误选择的先人，他们的罪孽才可以被原谅。

2 原文

以上文章是AI扩充之后的，原文在下面：

明末的那些资本家投降清朝，因为他们觉得会和元朝时一样，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。但是，他们错了，清朝完全没有给他们任何空间。实际上，汉人直到李鸿章曾国藩的时代才开始翻盘(李鸿章曾国藩并不值得肯定，但的确直到他们，汉人才掌握了实权)。但是，历史的机遇早就错失了。接踵而来的就是通常所谓的百年屈辱，可以说，中国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，中华文明就此终结都是有可能的，或者最多也就是一个二三流国家。这件事对整个中华民族都是一个大教训，投靠异族文明，即使在个人层次上也是赌博，最终你会输得精光。而在国家民族层次上，更是在当历史罪人，在断送子孙后代的未来。

远的不说，就说近百年移民美国，追求自由的那些人，谁获得了自己期待的发展空间，据统计，80%以上都绝后了。人类社会从来不是含情脉脉的，要么你在同异族的竞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，要么你最终就是消失。当然，中国人不怕竞争，因为我们向来是竞争的胜利者，但是，你孤身入狼穴与狼共舞，还能不能最终取得竞争的胜利呢？恐怕你得好好掂量一下。

我对满族人没有偏见，满族也是中国的一份子，但是因为历史的原因，满族人中即使最优秀的那些，比如王朔，也是一直在解构中国的历史和文化。因为那时候中国还不够强，王朔得证明自己的优秀，所以落后的只能是你中国的传统和文化。人性就是这样，王朔的心理和你一个汉人的心理是不同的，只是我们后知后觉。